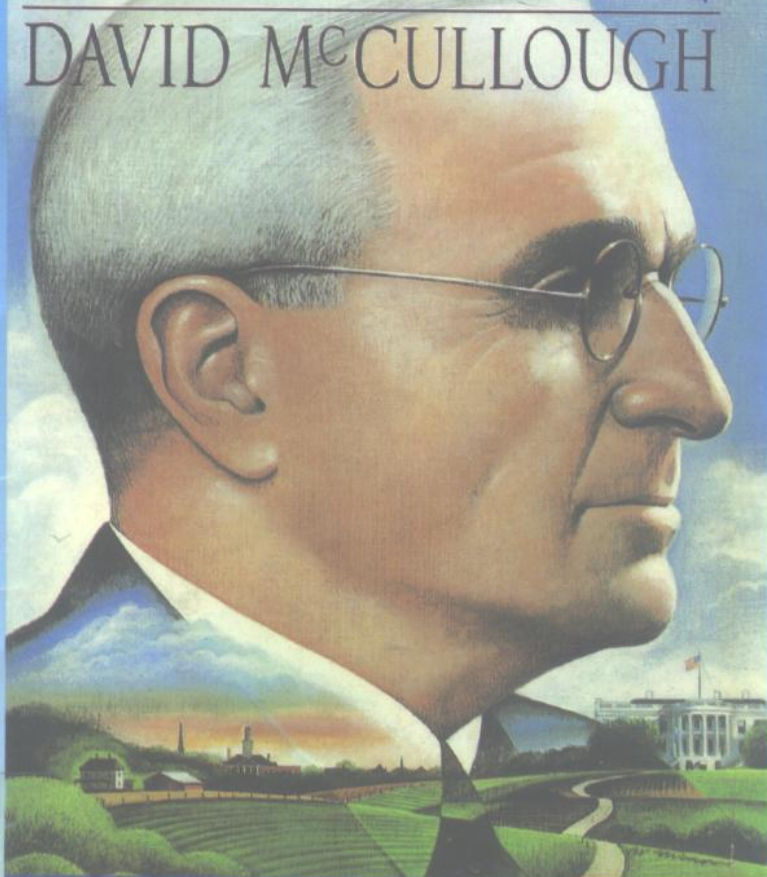


TRUMAN

DAVID McCULLOUGH



获美国普利策奖

杜鲁门传

下

[美]戴维·麦卡洛

杜 鲁 门 传

(下 册)

〔美〕戴维·麦卡洛

王秋海 罗 毅 胡国成 牛宇胜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036561

责任编辑:李豫生

封面设计:丁 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鲁门传/(美)麦卡洛(Mccallough,D.)著;王秋海等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ISBN 7-5012-0820-4

I. 杜… II. ①麦… ②王… III. 杜鲁门, H. S. -传记 IV.
K837.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3187 号

图字:01—1997—008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36.5 字数:940000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定价:48.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 四 部

总 统 先 生

十一、责任止于此

且看小小杜鲁门

鼻青脸肿一身泥——可不是吗！

——《芝加哥论坛报》

1

杜鲁门在 1945 年初秋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中这样写道：“为能得到点儿什么，大家都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谁也不为别人着想。”

10 月的某一天，白宫外树木的叶子已开始变黄，杜鲁门坐在办公桌前，又给母亲和妹妹写了一封信说，华盛顿社会生活中每平方英尺内唱主角的人比有史以来所有歌剧团里的主唱加起来还要多。

某日，杜鲁门参加了美国军团在密苏里州卡拉瑟斯维尔举行的一次集会。站在彩旗飘舞的主席台上，他提醒国人每场战争结束后都必然会出现衰退，困难将随之而来。“不遇困难一事无成”。

失误在所难免，想有所建树就不能指望避免失误，只有什么事都不做的人才不会犯错误。

在肯塔基州吉尔伯特维尔大坝落成典礼上，杜鲁门号召全体美国人团结合作，大家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同心协力”。

杜鲁门已不再是个战时总统，他发现和平时期的工作远比想象的难做，也更令人伤脑筋。7月份在柏林一个用大卵石铺成的广场举行的小型军事仪式上，他还曾信心十足地说：“战争时期做得到的，和平时期也一定能做到。只要我们倾全力…为和平而奋斗，便有望迎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然而，在人们都不愿再合作的今天，这一切又怎么是可能的呢？

在停泊在东京湾内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日本投降仪式后不几天，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交了他战后的第一篇咨文，他的麻烦也就开始随之而来。该咨文于9月6日送抵国会山，长约1.6万字（是西奥多·罗斯福时代以来最长的一篇咨文），其中提出了一项21点国内计划，内容包括增加失业救济补助金；即刻提高最低工资；常设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实行税收改革；为农场主提供收成保险；将战时权力与经济稳定法延长整整一年，意思是保持政府对工商业的控制；设立联邦住房救济金，以便每年新建100万栋新的住房。

我们必须做下去，进一步开阔我们的视野。我们应当考虑对城市中大片的破败不堪的贫民区进行重建，以真正的美方式改变目前这些地区只有低收入阶层家庭居住的状况，将其改造成成为适宜各收入阶层家庭居住的地方……

这篇咨文全面透彻地阐述了革新思想，是一项内容广泛的行动纲领。在乘“奥古斯塔”号巡洋舰自波茨坦回国途中，杜鲁门便已着手起草这篇咨文。他将自己的想法口授给萨姆·罗森曼，并用了整整10天的时间集中精力对草稿进行补充、编辑和修改。他不愿

等到发表国情咨文时再提出自己的内政纲领，也不打算将它零打碎敲地提交给国会。他需要的是一大篇从一开始就将其内政纲领引向自由派道路的咨文，时间将会证明其意义之重大。罗森曼对杜鲁门说，在参议院中跟随本党领袖投票赞同这样一项计划是一回事，而自己作为党的领袖去推荐和争取支持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内的保守派一直在兴冲冲地断言，新政已寿终正寝，“罗斯福愚蠢的计划”终于结束了，因为他们“了解”哈里·杜鲁门。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猛然的醒悟。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乔·马丁抱怨说，即使罗斯福也从未“开一次会”就要求那么多。杜鲁门在国会的同党中有许多人也同样对此担忧而不愿附和他。由共和党人和南方的民主党人组成的保守派联盟从1937年起便一直在为难罗斯福，这一次也准备好了要使他的继任者受阻。包括14位民主党人和10位共和党人的众议院赋税委员会投票决定拒绝考虑失业救济补助金的建议，并暂缓考虑进一步向失业者提供救济。正如报上所说，杜鲁门所期望的长达6个月的“与国会共舞”的时期在开始前便已结束了。

劳工领袖们要求取消工资管制，但限制物价。工商界领导人的要求则恰好相反。谁都不愿再看到由战争引起的那种物价飞涨。然而，尽管大多数日用品供应短缺，却几乎人人都有钱可花——人们手中的战时公债和银行储蓄已达数十亿美元。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仓促地解除了大笔的战时合同，在不到一个月之内解除的合同额已达150亿美元。波音飞机公司解雇了2.1万名工人，福特汽车公司则解雇了5万人，而此时，成千上万的军人正陆续回归故里，指望找到一份工作。穿制服的男男女女足有1200万之多，他们都希望能尽快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有关经济将面临厄运的预言已成为老生常谈。此时，杜鲁门仍对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营男子服饰用品而受挫的教训记忆犹新，在向国会介绍当时国家的境遇时，他提醒道：“我们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它后来以1920年和1921

年的大崩溃告终。我们必须确保这次不再犯同样惨痛的错误。”其实，大萧条比这严重得多，也更容易记起，直到1939年战火在欧洲燃起时都未真正结束。假如战争的结束真的意味着回到战前的“正常”状态，那么前景的的确确是够严酷的了。

众所周知，美国靠这场战争繁荣了起来。1945年美国商品和劳务总产量是1939年时的两倍多。虽然生活费用上涨了约30%，普通工人的收入却也翻了一番，失业率也低于2%，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农业收入是杜鲁门在格兰德维厄经营农场时的5倍。美国人还从不知道有这样的繁荣。然而，人们也都普遍认为困难时刻肯定会再度出现，这种观点根深蒂固。在整整一代美国人的脑海里，对于再次发生大萧条的恐惧永远都不会逝去。父亲们在饭桌上告诫家人：“危机肯定会发生，而且下次情况糟得会使你毛骨悚然。”那些所谓专家的看法也同样悲观。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在10月19日一次内阁会议上呈给总统的报告中估计，在未来数月内国民生产总值将下降400亿美元，工资总额将减少200亿美元，这就意味着到来年春天将会有700万至800万人失业，1939年的情形又将重演了。

即使当时有时间筹划和准备，即使当时有可能对“让士兵们回家”的呼声置之不理，使复员工作以较为缓慢的速度按部就班地进行，恢复期里的问题依旧会十分棘手。实际上，突如其来的和平几乎同突如其来的战争一样，使整个国家措手不及。1941年以来，由于“打仗”，民众们已心甘情愿忍受物品短缺和生活不便之苦，对设定工资最高限额和住房供给不足也已习以为常。但现在，他们似乎急于要补偿失去的时间，各种要求一下子都冒了出来。

到10月份时，全国都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房荒。据报道，仅在芝加哥市，就有10万名复员军人无家可归（芝加哥市准备不久将出售废弃电车供改装为住所之用）。各方来信雪片似地飞往白宫，其中有一封寄自住在洛杉矶的一位男子，信中讲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无家可归的退伍中士军医，妻子已有身孕，还有一个

幼小的孩子，他看这家人无处栖身，便留他们在自己家里住了一夜。在信中他恳求总统：“办点实事吧。”

工会组织已不再受战时不罢工承诺的约束，提出了“递升式”增加工资的要求。一时间，几乎所有行业都发生罢工。纽约州有1.5万名电梯操作员罢工，其他州则有2.7万名石油工人和6万名伐木工人甩手不干了。与此同时，在华盛顿，新政派人士正大批地退出政府。

所有这一切对杜鲁门来说实在是难以理解。他对经济学知之甚少，而重建的经济学又是如此纷繁复杂。他怎么都不能理解，一个在战争时期表现出极大的奉献精神 and 顽强毅力的民族竟会突然间变得这样极端自私，对公益这样漠不关心。他告诉母亲：“国会碍手碍脚，劳方荒唐透顶，资方也近乎发疯般地自私。”母亲住在格兰德维厄的一幢小木板房里，杜鲁门遇事总少不了征询她的意见。杜鲁门始终相信古代共和主义者公民权的理想，在他的心目中，辛辛纳特斯这位在拯救祖国后解甲归田的传奇式的罗马勇士一直是位英雄。他总喜欢告诉来客，他已把办公桌上的大炮模型换成了一台亮晶晶的模型犁。

他所能做的就是比以前更努力地工作，在他看来，日程安排得更满更忙一些，动作更快一些，接见的人更多一些，外出更频繁一些，似乎至少可以为大家作出表率。在非常典型的一天上午，两小时内他便接见了十好几位来客，其中有来自田纳西州的众议员艾伯特·戈尔，给他带来一瓶杰克·丹尼尔斯酒；参议员惠勒；他在杜鲁门委员会里的前助理马克斯·洛文撒尔；维尔京群岛总督；另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帕特·坎农，来谈飓风造成的损失问题；明尼阿波利斯市年轻的民主党人市长休伯特·汉弗莱夫妇；一群倡议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妇女（最后一批来客告辞后杜鲁门在约见单上写道：“平等权利，一派胡言乱语。”）。他工作起来“风风火火”，一篇报道中称他这种坚决果断的工作方式现已被公认为“典型的杜鲁门风格”。他作出改变时总是“急匆匆地”

大笔一挥，其实极少有事关重要之处，只是“凡事必快”而已。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把5分钟的时间都用来宣布一批决定，包括改组劳工部、将经济稳定局转归约翰·斯奈德领导下的战时动员及恢复局、任命来自圣路易斯的斯图尔特·赛明顿为新成立的剩余资产管理局局长、接受陆军部长史汀生的辞呈并任命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接任、提名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哈罗德·H·伯顿为最高法院法官。宣布结束后，一位记者不禁问道：“总统先生，还有吗？”全场哗然大笑。

这种时候总是令他十分得意。他喜欢用具有声望与权力的重要职位奖赏给像斯奈德这样的忠实的老朋友。这是这位成功的政治家一生中的主要乐趣之一，更不消说他是人们心目中的一位出色的杰克逊式的民主党人。他事无巨细总是尽心尽力地去做。他实在不愿解除埃迪·麦金的职务，便在农村财政委员会中给他安排了一个闲职。他的海军助理贾克·瓦达曼由于开始越权行事得罪了包括贝丝·杜鲁门在内的白宫里一大批人，因此，得把他悄悄打发出去，于是杜鲁门把他安排到了联邦储备委员会，而瓦达曼任此职务显然是不适合的。即使是像密苏里州参议员贝内特·克拉克这样多年来一直给杜鲁门出难题的人也没有被遗忘。9月12日，杜鲁门任命克拉克为设在华盛顿的美国上诉法院陪审法官。不久以后，克拉克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小镇贝里维尔举行再婚典礼，杜鲁门又站在他身边作男傣相，这对杜鲁门来说也是破天荒的。

那年秋天，有两场正式仪式使杜鲁门深为感动，也尤为难忘。

9月21日亨利·史汀生退休那天，阳光明媚，一个小型仪式在玫瑰园举行，杜鲁门极为庄重地将战时优异服务勋章授予这位年迈的陆军部长。他的部下这时才意识到，只有在这种场合，杜鲁门才显得出类拔萃。他对于小范围交往得心应手，这时，他变得易于接近，无拘无束，但同时他又十分清楚这种场合的意义之所在。那天是史汀生的78岁生日，也是他在华盛顿的最后一天。杜鲁门在给已回到独立城的贝丝的信中写道：“假如政府中有人有

资格获得一枚（勋章），那便是那个好人。”

11月，在五角大楼大院里，又举行了一场同样令人感动的欢送仪式，这次是为马歇尔将军。杜鲁门也将战时优异服务勋章授予了他，这是将军唯一的一次接受美国战时军功章（马歇尔曾多次拒绝接受任何这类荣誉，认为战士们正在国外战死沙场，给他这种荣誉是不合适的）。在杜鲁门看来，马歇尔在赢得战争胜利中的功劳无人可及，因此他称马歇尔为两任总统的中流砥柱。杜鲁门曾发自内心地赞叹道：“马歇尔是有史以来伟大的指挥官中最为出色的一位。”后来，杜鲁门又说过多大的勋章都不足以表彰马歇尔将军。

然而，这种场合毕竟不多见。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有近乎绝望的感觉，要做的事情太多，自己真正的发言权又太少，也从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集中解决任何问题。他有些不堪重负了。他告诉母亲：“这儿的压力太大，我几乎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他周游全国进行巡回演讲，想以此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人民，却常常收到相反的效果，使人觉得他这么做是出于个人目的。在密苏里州卡拉瑟斯维尔的那次美国军团集会上，他大谈将要面临的“困难”，并有创见地郑重谈到了原子弹问题。他已要求国会成立一个新的由文官而不是由军人控制的原子能委员会，认为“原子能的释放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其划时代意义之重大难以在旧思想体系中把握”。他告诉与会者，要想在世界上和睦相处，就必须遵循《新约》中的“为人准则”，这听起来幼稚得活像《史密斯先生进京》中的史密斯先生。

我们再也经不起另一场全球战争了，我们不能再打了，除非是总体战，而总体战则意味着我们的现代文明的终结，我们不会那样做的。我们要接受那“为人准则”，并准备在前进道路上面对上帝为我们安排的命运。

卡拉瑟斯维尔位于密苏里州东南部的“鞋跟”处，盛产棉花。杜鲁门来此开会期间曾在一天早晨散步时停下来朝密西西比河里吐了一口痰——他对惊呆了的记者们解释说，这是当地的一项传统习俗。他也曾在旅馆的小餐厅里弹了一会儿钢琴，在一家杂货店举行了公开招待会，还参加了赛马会，并在餐巾和空白帐单上为大家签名，甚至还在一辆机车模型上与美国军团成员们合影，也敲过钟。《华盛顿邮报》说：“他除了没有把自己从炮口里射出来以外，什么都做了。”

数百名民主党参众议员参加了在切萨皮克湾杰弗逊岛上一个俱乐部内举行的一次会议，在会上，杜鲁门让大家叫他哈里，还在走廊上同大家一起玩“沙蟹”牌。事后，某位不知其名的参议员回忆说，哈里·杜鲁门“牌技非常娴熟”，另一位在场人（同样不知其名）则说每个人都玩得非常开心，“吃的东西应有尽有，大家喝得畅快淋漓——只有两个人醉了”。

人们在提到总统的朋友和同事时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密友”一词。哈里·沃恩显然也被自己出人意料的得势冲昏了头，开始自己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演说。沃恩还大言不惭地吹嘘他在波茨坦将一块价值 55 美元的手表以 500 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俄国人。另一次，他在弗吉尼亚州向一群基督教长老会的妇女发表讲话时，为了企图说明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位总统的区别，竟说在吃厌了鱼子酱之后，国家准备换吃火腿蛋了。

总统班子中的一些人对白宫内的混乱状态越来越感到担忧。预算署长哈罗德·史密斯认为杜鲁门头脑敏锐，才思敏捷，但遗憾的是缺乏条理。在 10 月中旬举行的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上，杜鲁门自己也承认对于情况的发展感到“意气消沉”，表示要减少约见，取消一部分旅行计划。助理新闻秘书埃本·艾尔斯写道，这一决定已使大家“欣喜不已”，因为他早就在为哈里·沃恩和有关扑克牌游戏、酗酒的传闻感到担心，认为长此以往迟早会带来麻烦。艾尔斯并无出众之处，说起话来柔声细语，被白宫里的记者们称为

“咕啾先生”，他一直暗中坚持记日记，这些日记有朝一日会成为记载杜鲁门时代“内”幕的宝贵资料。

从外表看，杜鲁门并无太大变化。记者们称他“精力充沛”、“和蔼可亲”、“温文尔雅”、且看上去“镇定自若、充满活力、生气勃勃”。专栏作家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则写道：“他从来都是衣冠楚楚，像是老妈妈刚刚为他打扮整齐，梳头后要去参加草莓聚餐会那样。”他依旧甚得人心，称许率一直保持在80%左右。

若国会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提出更多的要求。一位总统的要求受到国会的回绝并不少见，但一位总统在多次被回绝之后，仍不肯改变战术，实为罕见。

他要求通过扣薪办法实行国民强制健康保险。按这个计划，全国公民，无论其支付能力如何，都能够享受到医疗及住院服务。当复员呼声高涨时，他却在一次联席会议上号召实行普通军训，尽管这一想法不可能获得通过，但他本人仍坚信不疑。“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和平必须建立在实力、良好的愿望及优良的品行的基础上”，国家再也不能指望长年累月地武装自己。因此，他希望在18—20岁的青年男子中实行一年的强制军训制度，使他们成为训练有素、遇紧急情况时召之能战的后备军人，而非武装部队。

某天早上，杜鲁门站在办公桌旁，向记者们展示了一面新的总统用旗帜，他让哈里·沃恩将旗举高些，好让大家看得清楚些。他解释道：“新旗帜上的鹰朝向旗杆，这样在行军时它始终向前看，同时也使它看着象征和平的橄榄枝，而不是象征战争的箭……”。总统的旗帜和印章都重新进行了设计，这自威尔逊时代以来还是第一次。杜鲁门想通过改变鹰的注视方向来象征美国正在前进，并致力于和平。

10月26日，杜鲁门到纽约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主持了新建造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号巨型航空母舰编入现役的典礼。稍后，他在密苏里号战舰的甲板上检阅了哈得逊河中50艘的一排军舰，1200架海军飞机在天空翱翔。鹰的爪从未抓过这样的箭。这种国家

力量的公开展示也是任何一位最高统帅都未曾看到过的。但是，这一切都在迅速消失。倘若杜鲁门在1945年末就试图停止正在忙乱进行的复员工作，保持美国战斗力量的完整，他可能早就被弹劾了，因为全国上下都热切渴望在战争胜利、敌人被消灭后让青年男女回来。过后，杜鲁门说，这哪里是复员，“简直是解体”。

在乘车前往中央公园去发表海军节演说的路上（这是第一次由电视转播的总统讲话），费尔雷洛·拉瓜迪亚市长告诉杜鲁门和李海海军上将，街道两旁欢呼的群众至少有三五百万之多。杜鲁门等在敞篷车中向沿途群众挥手致意，这一场面对李海来说是没有哪一位罗马皇帝会梦想得到的凯旋仪式。

尽管如此，新闻界对杜鲁门的评价一直是政绩平平。·记者们批评他处理重大问题时“小家子气”，常常“胡乱应付”，凡事总是依赖于“一种显然不由自主而又时常挂在嘴边的坚定信念，即所有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地解决”。

劳工状况持续恶化，纠察线成为这一时期的既定标志。杜鲁门也开始变得举棋不定。他呼吁通过集体谈判合理地增加工资，表面看来似乎是支持劳方。但随后，由于受到来自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两方面的要求对工会采取强硬政策的压力，他提请国会禁止全国性大型工业企业的工人举行罢工，直至30天后事实调查委员会对形势作出评判为止，这一想法使劳方、资方、国会三方都不满意。与此同时，通用汽车公司的17.5万名员工和19个州的工厂的工人开始罢工，这场罢工持续了三个多月。

杜鲁门对作家约翰·根室抱怨说，他的工作吃力不讨好。根室自杜鲁门就任副总统后就一直没同他见过面，这次见面后不禁大为感慨，事后他写道：“他的嘴边已有丝丝皱纹，满脸的疲惫、茫然和烦忧。”

另一日，罗伯特·奥本海默来进行私人拜访，交谈中他显然忧心忡忡地说，由于他在原子弹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他手上沾满了鲜血。这席话使杜鲁门极为不快，特别是奥本海默自怜自哀、牢

骚满腹的态度更是令人生厌。杜鲁门告诉奥本海默：“是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就由我来操心吧。”过后，杜鲁门表示他希望再也不会见到那人了。

11月，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杰·赫尔利回国述职，突然宣布他要辞去大使职务，理由是国务院同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一边。他是在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时透露这一消息的，而就在一小时前他还跟杜鲁门说中国形势已恢复正常，他不久便会回到中国去。数年之后，杜鲁门写道：“这简直是难以理解的180度的大转弯，我始终想不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当时他的态度比较直截了当。他从白宫自动收报机上扯下黄色的新闻稿，怒气冲冲地闯到内阁会议上，大叫道：“看这个狗杂种是怎么对我的！”

农业部长克林顿·安德森建议总统立即提名马歇尔将军为新任驻华特使，以便将报界的注意力从赫尔利身上转开。这是一项御用建议。杜鲁门随即在红厅给正在弗吉尼亚州利斯堡家中的马歇尔挂了电话。

“将军，我想让您为我到中国去。”杜鲁门说道。

“遵命，总统先生。”马歇尔说罢便挂上了电话。

杜鲁门实在不愿打这个电话。当时马歇尔总共才退休6天。后来马歇尔解释道他所以匆忙挂电话是因为他的太太走了进来，他想亲自向她解释，而不是让她无意中听到电话上的谈话内容。

12月，在橄榄球场俱乐部举行的晚宴上，杜鲁门半开玩笑地宣布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的观点是错误的。“我要告诉大家，我发现和平是地狱……”

杜鲁门的医疗保险计划亦无进展。在杜鲁门认为同样重要的另一篇咨文中，他提出将武装部队统一划归国防部长一人指挥之下。这一主张遭到了海军的强烈反对，鲍勃·汉尼根则认为这样做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并说发动一场自己可能会输掉的不必要的战斗愚蠢之至。但杜鲁门仍固执己见，他的意图是要削弱西点军校和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派系的权力，使武装部队更为民主。这

一崇高的抱负尽管得到了他周围许多人的赞同，但他们都认为不可能实现。杜鲁门则认为提出这篇咨文是他的责任，因为它代表了他的信念。

萨姆·罗森曼越来越欣赏杜鲁门这个人了。在他看来，杜鲁门同罗斯福的主要差别在于杜鲁门“更少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对他重新当选的机会产生什么影响……杜鲁门做的许多事罗斯福可能永远都做不到，因为罗斯福知道那样做会有什么后果”。

在许多人看来，总统同国会议员的亲密关系——议员们谈到的好老兄哈里等等——已表明为一个不利条件。假若他的纲领彻头彻尾地保持罗斯福的传统，议员们可能会像在战前对待罗斯福一样地顽固不化。只是现在没有了这样的担心，即杜鲁门会像罗斯福那样将问题提交全国人民并产生强烈的效果。杜鲁门无法使“他们感到敬畏”，正如有人所说，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敬畏”常比同志情谊更能获得良好的结果。

就在此时，杜鲁门个人觉得吉米·贝尔纳斯向他通气不够，贝尔纳斯当时正在莫斯科出席外长会议。杜鲁门也曾向亨利·华莱士谈起他担心和平时期对原子能的利用会大大缩短工作日，因而人们会“胡闹起来”。在12月份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华莱士婉转而又尖锐地训斥杜鲁门怎么会不知道现存原子弹总共有多少枚，也训斥他还说确实不想知道有多少枚，华莱士坚决认为：“总统先生，你应当知道。”事后，华莱士在日记中写道：“总统先是窘迫地规避说他想他应当知道，后又掩饰道：‘我大体上还是知道的。’”

杜鲁门从贝尔纳斯和华莱士那里获得的一个明确的印象是他们俩都认为自己的见解远比总统的高明。

在许多从罗斯福时代留任下来的官员和别处著名的自由派人士看来，现政府似乎在支离破碎。《下午报》是在纽约出版的一家言辞尖刻的自由派报纸，专栏作家马克斯·勒纳在该报撰文刻薄地评价杜鲁门总统，称他为历史上“失控的事故”之一。勒纳写道，过去也有一些领袖的伟大是环境造就的，但从未有人在接任崇高职位时如

此志忑不安。勒纳曾到过密苏里州，自认为了解杜鲁门的长处和不足。杜鲁门总统的“首要品质”是对人诚实，对朋友忠诚，工作也勤恳。依勒纳看来，压倒一切的问题是总统的“中产阶级心态”：

在遇到危机时，有中产阶级思想的人总是转而依靠个人品德和私人关系；在遇到危机时，有中产阶级思想的人表现为更加害怕工会、罢工，害怕工会的政治力量胜于害怕任何其他东西；在遇到危机时，有中产阶级思想的人总是努力清高地超脱于当时的重大问题之外，试图漠视真正的社会分歧和斗争。

这些斗争不能靠某个人呼吁合作来调和，人们最终还应决定自己的立场并按照自己的立场进行斗争。最后，杜鲁门总统的基本弱点在于他未能运用充分的想象力来理解他所担任职务的实质及重要性。

圣诞节前一个星期，贝丝、玛格丽特和马奇·华莱士便回独立城去了，杜鲁门则一直在白宫里呆到圣诞节那天上午，尽管天公不作美，他还是决定飞回家去。两星期前，华盛顿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12月19日，一场暴风雪又席卷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积雪达5英寸之厚。圣诞节那天早上，杜鲁门一觉醒来，发现窗外风声大作，雨雪交加。人们告诉他国家机场已被冰雪覆盖，所有营业性航班都已取消。在同他的飞行员汉克·迈尔斯中校商议后，杜鲁门决定还是要飞回去。当“圣牛”号专机终于飞出堪萨斯市上空的云端时，已比预定时间晚了1个多小时。报界和广播评论员均认为此次飞行愚蠢之至，《纽约时报》称之为“一位国家元首‘所作的最为危险和‘感情用事的旅行’之一”。若有人知道他在抵达北特拉华大街自己的大灰宅院时家人迎接他的那种情况，这次旅行就显得更无必要，他的境况也更加可怜了。贝丝不是那种感情用事的人，因此对杜鲁门此举并不赞成。三天后，杜鲁门回到华盛顿，他坐在办公桌前，写了他一生中最为心灰意懒的一封信：

亲爱的贝丝：

我已回到了白宫这座充满抱负和名望的巨大白色坟墓。我觉得自己好像去年筑起的鸟巢在经历第二年的风吹雨打。我并不经常承认自己状态不好，我想这样可能会惹你生气，就像其他许多我做过的或妄想去做的事情一样让你生气。但我的本意并非如此……

你决不会意识到这对我意味着什么，那天晚上，我在做完我并不想做的一大堆事情后回到家中，却发现有个个人在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那神情就仿佛我是猫拖进来的什么东西，而这世上我唯一珍视的就是这个人的嘉许和有益意见。这个人还对我说我之所以终于回家了是因为我找不出任何呆在外面的理由了。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掩饰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呢？

我的脑袋应当再大一些，匀称一些，里面的脑力应当再多一些，再多一些自我的才能或其他什么能使我知道世界上确实能够有第1号人物的东西。我并不想做头号人物，但是，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相反意见，《生活》和《时代》杂志都说我是头号人物（那周他作为“本年度风云人物”而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如果真是这样，你、马吉和其他能影响我行动的人都必须给我帮助和支持；因为没有人像我现在这样亟需帮助和支持。倘使我能利用全国最佳的智囊人物并得到我所敬慕的家人的一点点帮助，便会大功告成……

吻我的宝贝，我永远爱你。

哈里

1945年12月28日

考虑再三，他没有将这封信寄出去，而是把它连同未用过的